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省域内 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于峰¹, 卢进勇²

(1.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1418;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 学界存在分歧。本文从中国省域内收入分配效应角度入手, 选取1995—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实证检验现有观点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显示: 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究其原因: 外资企业采取“两头在外”和技术封锁的经营战略, 低技术层次的内资企业难以融入外资企业的产业链,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受阻, 内、外资企业薪酬制度差异。鉴此, 本文提出: 中国应提高外资企业的在华根植性, 鼓励外资公司转让关键技术, 适当限制过高收入,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大力推进教育培训事业和国内外交流合作, 健全知识产权制度。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收入分配; 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 F83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05(2014)03-0090-07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ese Provin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YU Feng¹, LU Jin-yo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an existing divergence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1995—2010 using the fixed effect variable intercept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existing opinion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rovin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pands the income gap in china. The reasons for the phenomenon are that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choose the business strategies of both “two outside” and technology blockade, and that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with low technical level are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that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encounters resistance, and that the salary systems are different between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the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embeddedness of the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encourage invested enterprises to transfer the key technology, properly limit the excessively high

收稿日期: 2013-12-09

基金项目: 上海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14YS120)

作者简介: 于峰, 女,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 卢进勇, 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合作研究。

income, perfect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mplement the financial transfer and payment system, develop the education training career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oth home and abroad, and perf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fixed effects variable intercept model; gini coefficient

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对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的日益加大,大量国外资本涌入中国,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外商直接投资(即FDI)对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否有影响?若有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否有规律可循?中国应该如何设计政策体系来应对这种影响?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开放经济下收入分配问题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此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是针对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在国际资本越来越跨国流动的今天,国际投资的收入分配效应却相对被忽视,研究文献并不多见。现有国外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单个国家FDI的收入分配效应,其代表性研究有:Feenstra和Hanson(1997)^[1]、Figini和Görg(1999)^[2]、Taylor和Driffield(2005)^[3]使用工业数据分别考察了墨西哥、爱尔兰、英国的FDI的收入分配效应。这三个研究都认为FDI对收入分配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后两个研究还发现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是FDI的非线性函数。但是Blonigen和Slaughter(2001)^[4]对美国相应数据的研究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收入分配平等程度与FDI毫无关系。另一类是研究多个国家FDI的收入分配效应。其代表性研究有:Kuznets(1955)^[5]从理论上阐述一国经济增长对其国内收入分配不均的长期趋势是先扩大后缩小,即收入分配不均与经济增长呈倒U曲线关系。Adelman和Morris(1973)^[6]第一个实证验证收入分配不均与经济增长的倒U曲线关系的存在性。虽然Kuznets、Adelman和Morris没有直接讨论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不均的作用,但他们都将外资内资视为同质资本,内资外资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依据他们的研究,FDI与东道国收入分配不均也呈倒U曲线关系,他们的研究也成为FDI的收入分配效应领域的开创性研究。Chase-Dunn(1975)^[7]第一次对多国FDI与其国内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是FDI推动东道国收入差距的扩大。Tsai(1995)^[8]分析33个发展中国家FDI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其结果表明只有部分亚洲国家FDI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均等化。Figini和Görg(2006)^[9]应用全球100多个国家1980—2002年的数据来考察FDI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关系,其研究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是FDI的一元二次函数。国内学者基本上是从宏观角度来考察FDI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依据考察的宏观角度,国内文献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研究FDI对中国地区间收入分配的作用,其代表性研究是高连水(2011)^[10];第二类是研究FDI对中国城乡收入分配的作用,其代表性研究是何枫和徐桂林(2009)^[11];第三类是研究FDI对中国行业间收入分配的作用,其代表性研究是陈超和姚利民(2007)^[12]。纵观文献,国内外有关FDI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都比较薄弱,且对于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存在分歧;而且有关中国的此方面研究很少考虑更微观、更具体问题,即FDI对中国省域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问题。鉴此,本文从中国省域内收入分配效应角度入手,通过实证分析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究FDI对中国省域内部收入分配的实际作用效果,检验现有FDI与收入分配不均关系的观点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而分析原因、提出建议。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讨论

目前国际学界对于FDI影响东道国收入分配的机理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FDI与东道国居民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即FDI先加剧东道国收入分配的不均,随着FDI达到一定水平后再减少东道国居民收入差距。其理由有两个:一是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技术进步的初始阶段,企业主要采用旧技术,很少使用新技术,对掌握新技术劳动者的需求极小,因此掌握新技术的劳动者工资与掌握旧技术的劳动者工资并无明显差异,而且整个国家的劳动者主体是掌握旧技术的劳动者,因此从整体上看整个国家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随着新技术的日臻成熟,新技术的经济效益开始显现,企业对掌握新技术劳动者的需求增强,这导致掌握新技术的劳动者工资与掌握旧技术的劳动者工资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开,整个国家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到了技术进步的后期,随着新技术的普及和旧技术的退出,整个国家的劳动者主体变成了掌握新技术的劳动者,因此整个国家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又反过来日渐缩小。而外商在东道国投资设厂将给东道国带来先进的技术,是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因此 FDI 对东道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技术进步对东道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一样,是先增加东道国收入差距,后减少东道国收入差距。二是根据现代化假说,在短期内,由于起初 FDI 集中于东道国的具有比较优势行业,这刺激这些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的劳动者收入大幅提高,进而使得东道国收入差距加大,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行业发展带动东道国经济增长,这使得东道国其他人群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进而促使东道国国民收入更均匀地分配,因此 FDI 是先增加东道国收入差距,后减少东道国收入差距。

第二种观点认为,FDI 对东道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只有上述第一种观点中 FDI 对东道国收入差距的前期影响,即 FDI 与东道国居民收入差距是正相关的。其理由也有两个:一是外商为了保持其技术垄断优势以获取超额利润,不会将其拥有的先进技术扩散给东道国,因而这也就没有了上述第一种观点中新技术普及和旧技术退出的技术进步后期阶段,即这也就没有了上述 FDI 减少东道国收入差距的阶段。二是根据依附假说,随着 FDI 在东道国的增加,FDI 集中的行业劳动者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高收入的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会想方设法地维持和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诸如帮助外资企业挤垮内资企业,通过掌控或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这导致东道国失业率提高,收入差距增加。

第三、四种观点刚好与第一、二种观点相反,它们认为 FDI 与东道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正 U 型关系、负相关关系。它们认为:第一、二种观点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第四种观点的理由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技术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已经很高,FDI 并不能给发达国家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更优厚的收入,FDI 只是加速了发达国家本土孕育的新技术的扩散和经济增长,与第一种观点后期阶段一样,带来了收入差距缩小。第三种观点在第四种观点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发达国家 FDI 涌入越多,市场竞争越激烈,从而引发更先进的技术和更优厚的收入产生,与上述第一种观点后期阶段一样,这将造成收入差距缩小。第五种观点认为 FDI 与东道国居民收入差距无关联,这种观点只被极少数学者认同。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省域内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上述五种观点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造如下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GINI_{it} = c + c_i + b_1 FDI_{it} + b_2 FDI_{it}^2 + b_3 EDUCATION_{it} + b_4 TRADE_{it} + u_{it} \quad (1)$$

其中, i 表示第 i 个省级地区; t 表示第 t 年。 c 表示均值截距项,对于各个省级地区是相同的; c_i 表示第 i 个省级地区个体截距项,对于各个省级地区是不同的。 b_1 、 b_2 、 b_3 、 b_4 表示变量系数。 $GINI_{it}$ 表示第 i 个省级地区第 t 年的基尼系数。它可以通过城乡分解法得到,首先在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无论分组是否是等份)数据的基础上,依据计算公式:

$$GINI_{jt} = 1 - \frac{1}{POP_{jt} CI_{jt}} \sum_{k=1}^m (CI_{jt(k-1)} + CI_{jtk}) \times POP_{jt} \quad (2)$$

其中 i 、 t 意义同上, $j=c,r$ 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 k 、 m 分别表示居民收入分组的组别号、总组数,

$GINI_{jit}$ 表示第*i*个省级地区第*t*年的城镇或农村基尼系数, POP_{jit} 表示第*i*个省级地区第*t*年的城镇或农村总人口数, CI_{jit} 、 CI_{jikt} 、 $CI_{jit(k-1)}$ 分别表示第*i*个省级地区第*t*年累计到第*m*、*k*、*k-1*组的城镇或农村居民总收入;该公式是根据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图中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的比值推导得出。

直接测算出城镇的基尼系数和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再依据:

$$GINI_{it} = POP_{cit}^2 \frac{AI_{cit}}{AI_{it}} GINI_{cit} + POP_{rit}^2 \frac{AI_{rit}}{AI_{it}} GINI_{rit} + POP_{cit} POP_{rit} \frac{AI_{cit} - AI_{rit}}{AI_{it}} \quad (3)$$

其中*c*、*r*、*i*、*t*、 $GINI_{it}$ 、 $GINI_{cit}$ 、 $GINI_{rit}$ 、 POP_{cit} 、 POP_{rit} 意义同上, AI_{it} 、 AI_{cit} 、 AI_{rit} 分别表示第*i*个省级地区第*t*年的全地区或城镇或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该公式是 Sundrum 于1990年提出的。

将省级地区的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加权合成为省级地区的基尼系数。它数值越大,说明该省级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FDI_{it} 是第*i*个省级地区第*t*年的FDI,它的计算公式是:

$$FDI_{it} = \frac{FDISTOCK_{it}}{GDP_{it}} \quad (4)$$

其中 $FDISTOCK_{it}$ 表示第*i*个省级地区到第*t*年为止外方注册资本累计总额, GDP_{it} 表示第*i*个省级地区第*t*年生产总值。

它数值越大,说明该省级地区流入的FDI越多。 FDI_{it}^2 表示第*i*个省级地区第*t*年的FDI的平方项。根据FDI影响东道国收入差距的上述五种观点, FDI_{it} 和 FDI_{it}^2 前的系数 b_1 和 b_2 的显著性和符号都难以预期。 $EDUCATION_{it}$ 表示第*i*个省级地区第*t*年的教育水平,它的计算公式是:

$$EDUCATION_{it} = \frac{SKILLEDHR_{it}}{POP_{it}} \quad (5)$$

其中 $SKILLEDHR_{it}$ 表示第*i*个省级地区到第*t*年为止具有初中及其以上学历的人的数量, POP_{it} 表示第*i*个省级地区到第*t*年总人口数。

它数值越大,说明该省级地区的教育水平越高。由于一国或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则该国或地区居民高收入人群占比越大,从而缩小该国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因此 $EDUCATION_{it}$ 前的系数 b_3 符号预期为正。 $TRADE_{it}$ 是第*i*个省级地区第*t*年的贸易开放度,它的计算公式是:

$$TRADE_{it} = \frac{IMPEXP_{it}}{GDP_{it}} \quad (6)$$

其中 GDP_{it} 意义同上, $IMPEXP_{it}$ 表示第*i*个省级地区第*t*年进出口总额。

它数值越大,说明该省级地区与国外贸易往来程度越深。要素禀赋理论指出:对外贸易会提高一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价格,降低相对稀缺要素的价格。SS定理又在其基础上做进一步论证得出:贸易不仅会导致各国同质要素价格均等化,消除国际贫富差距;而且会改变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格局。但SS定理是在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下才成立的,这些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满足。因此,我们无法根据SS定理判断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开放度对其收入分配的影响情况, $TRADE_{it}$ 前的系数 b_4 显著性和符号难以预期。

(二) 计量估计与检验

我们应用上述实证模型于1995—2010年中国27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其中27个省级地区是指除去吉林、山东、西藏、海南以外的中国省级地区^①,即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模型中 $GINI_{it}$ 的面板数据来自田卫民(2012)^[13]; FDI_{it} 、 FDI_{it}^2 、 $EDUCATION_{it}$ 、 $TRADE_{it}$ 的面板数据都是由《中国统计年鉴》原始数据整理计算得到的。计量软件是EVIEWS软件,具体计量估计

①剔除吉林、山东、西藏、海南四个省级地区的原因是数据缺失,无法计算其基尼系数。

与检验的过程和结果如下。

1. 协整检验。首先应对实证模型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此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和模型是否是真回归。协整检验有两步,第一步对实证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检验方法下的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小于5%或10%显著性水平,则拒绝原假设,反之接受原假设。应用LLC、IPS、Fisher—ADF、Fisher—PP四种检验方法,结果显示:因变量 $GINI_{it}$ 是一阶单整,自变量中 FDI_{it} 、 FDI_{it}^2 、 $TRADE_{it}$ 均是平稳, $EDUCATION_{it}$ 是一阶单整。这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因为有两种情形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第一种是所有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第二种是因变量的单整阶数低于或等于任一自变量的单整阶数,且当因变量单整阶数低于自变量的单整阶数时,因变量的单整阶数必须低于至少两个自变量的单整阶数,本模型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属于第二种情形。第二步对实证模型中因变量与所有可能的自变量组合进行协整检验,根据上述计量检验的逻辑,应用Pedroni、Kao、Johansen三种检验方法,结果发现只有 $GINI_{it}$ 、 FDI_{it} 、 $EDUCATION_{it}$ 不仅存在协整关系而且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即 $GINI_{it}$ 、 FDI_{it} 、 $EDUCATION_{it}$ 之间的协整关系和 $GINI_{it}$ 、 $EDUCATION_{it}$ 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实证模型应剔除 FDI_{it}^2 、 $TRADE_{it}$ 两个自变量。

2. 模型形式检验。通过协整检验后,需要进行模型形式检验来选择最合适的实证模型形式。模型形式检验也有两步。第一步比较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根据上述计量检验的逻辑,应用协方差分析,得出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更为适宜。第二步比较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和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根据上述计量检验的逻辑,应用Hausman检验方法,得出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更为理想。因此实证模型应该选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3. 最终结果及其分析。在确定实证模型的最佳形式之后,为了消除自相关,在估计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时引入AR项,得到最终回归方程:

$$GINI_{it} = 0.41 + c_i + 0.04FDI_{it} - 0.03EDUCATION_{it} + 1.06u_{it-1} - 0.22u_{it-2} \quad (7)$$

最终计量结果表明:自变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上都通过t检验; R^2 和调整后的 R^2 都是0.96,很高; F 检验也通过; DW 值为2.36,基本没有自相关,因此最终计量结果有效可信(详见表1)。自变量系数反映出:中国收入差距与 FDI 呈正相关,这与前述东道国 FDI 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第二种观点一致;中国收入差距与教育水平呈负相关,这符合实证模型中二者关系的预期。

表1 最终计量结果

变量	系数	t 统计量	概率值	变量	系数	t 统计量	概率值		
c	0.41250	32.34189	0.0000	FDI_{it}	0.04107	2.15257	0.0320		
$EDUCATION_{it}$	-0.03004	-1.63788	0.1024	u_{it-1}	1.06364	24.19894	0.0000		
u_{it-2}	-0.22104	-5.06938	0.0000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c_1	-0.11778	c_2	-0.10509	c_3	-0.02031	c_4	0.02575	c_5	0.03232
c_6	-0.04075	c_7	-0.01329	c_8	-0.12313	c_9	-0.04298	c_{10}	-0.03293
c_{11}	-0.00507	c_{12}	-0.01356	c_{13}	-0.01673	c_{14}	0.00310	c_{15}	-0.01723
c_{16}	0.02769	c_{17}	0.00980	c_{18}	0.03279	c_{19}	0.01774	c_{20}	-0.01115
c_{21}	0.08210	c_{22}	0.06085	c_{23}	0.04788	c_{24}	0.07832	c_{25}	0.06687
c_{26}	0.04395	c_{27}	0.03082						
R^2	0.96298	调整后 R^2	0.95978	F 统计量	300.8904	概率值	0.00000	DW 统计量	2.35864

四、结论、建议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最终计量结果显示:FDI对中国收入分配有负面作用,扩大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指出的是:FDI的主要区域是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市,而实证研究中所用的数据包括大部分中西部地区,严谨地讲,中西部地区的某些与FDI无关的影响变量,诸如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相关规制设计不完善和执行不力等,也对其收入差距扩大产生明显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FDI扩大中国收入分配的这种现象?前述东道国FDI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第二种观点给出了粗略的答案,但它还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完善和解析。具体讲,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是外商到中国投资设厂是为了占领国内外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为此外商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优惠政策,并极力避免核心技术扩散。基于此,一方面中国外资企业多是“两头在外”,外资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原料、零配件、生产线、成套工艺设备等都从国外进口,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小。另一方面,外商为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防止技术外溢,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诸如在技术设计、生产工艺、包装广告等关键部分,设置一些难以破解其诀窍的障碍;对最新尖端技术、动态技术严密封锁,仅向中方转移“夕阳技术”、“中等技术”;主要研发设计中心都设置在海外,极少数研究机构在中国,引入到中国的绝大多数是生产技术;采取企业内部技术转让方式,严控技术扩散;通过独资化、控股化的方法取得企业的主导权,强化技术控制力。这两方面作用的结果是外商的先进技术没有转移给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始终保持相当大且不断扩大的技术差距,国内没有实现先进技术全面取代旧技术、先进技术被普遍应用,从而没有实现国内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减少。第二是中国是一个技术匮乏的国家。无论是内资企业或是科研机构还是劳动者,都没有在技术上达到较高层次。这导致内资企业、科研机构等没有与外资企业在生产上形成前后向关联等紧密联系,外资企业在国内根植性脆弱,FDI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同理,中、外资企业的技术鸿沟造成国内劳动者收入差距没有缩小。第三是伴随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吸引的FDI规模也越来越大,FDI分化了中国的不同人群。外资企业劳动者与其他人群相比掌握先进的技术、享受高额薪酬和很大的话语权。作为既得利益者,外资企业劳动者有强烈的动机去阻挠损害其经济利益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造成国内收入差距没有减小。第四是与内资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制度,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遵循市场规律,劳动者的薪酬与绩效挂钩,激励机制健全,形成了“高薪酬——高绩效”的良性循环,这导致国内收入差距没有减少。

(二) 政策建议

第一,FDI政策方面。一是强化内、外资企业的联系,使内资企业融入外资企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外资企业的在华根植性。二是鼓励外资企业转让关键技术。第二,收入分配政策方面。一是我国应通过对个人征收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适当限制过高收入。二是我国应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我国应通过直接发放实物、交付补助金、发放购物券等方式把富裕阶层的部分收入无偿地转移给贫困阶层,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第三,相关配套政策方面。一是大力推进教育培训事业和国内外交流合作。内资企业应加强对员工职业培训;大学、研究机构应加强与国外同行的合作交流;各级高等院校应顺应潮流及时调整课程。二是健全知识产权制度。

(三) 研究展望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问题将有越来越重要的研究意义。现有

相关研究取得了许多瞩目的成果和进展,为今后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着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领域。一方面,现有理论和实证模型需要完善和补充。比如探讨 FDI 对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路径机制,优化计量模型的变量选取、函数形式、估计方法和检验方法等工作,实证分析 FDI 政策实施对收入分配的实际作用效果等。另一方面,由于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已有研究结论模糊、不一致,未来研究会重视辨析不同研究结论的推演过程、修正和整合已有研究成果、构建统一而明确的研究结论等工作。

参考文献:

- [1] FEENSTRA R, HANSON G 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lative Wages: Evidence from Mexico's Maquiladora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42(3-4): 371-393.
- [2] FIGINI P, GÖRG H.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Wage Inequality in the Host Country: The Case of Ireland[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99,135(4):594-612.
- [3] TAYLOR K, DRIFFIELD N. Wage Inequality and the Role of Multinationals: Evidence from UK Panel Data[J]. *Labour Economics*,2005,12(2):223-249.
- [4] BLONIGEN B, SLAUGHTER M. Foreign Affiliate Activity and US Skill Upgrading[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1,83(2):362-376.
- [5]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1955,45(1):1-28.
- [6] ADELMAN, MORRIS C T.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 [7] CHASE-DUNN C.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pendence on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 Cross-National Stud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5,40(6):720-738.
- [8] TSAI P 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Further Evidence[J]. *World Development*,1995,23(3):469-483.
- [9] FIGINI P, GÖRG H.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Wage Inequalit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R]. Nottingha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2006.
- [10] 高连水. 什么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地区收入差距水平? ——基于 1987-2005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1):130-139.
- [11] 何枫,徐桂林. FDI 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 U 形关系[J]. *国际贸易问题*,2009(11):89-96.
- [12] 陈超,姚利民. FDI 对长三角制造业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07(8):99-103.
- [13] 田卫民. 省域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测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J]. *经济科学*,2012(2):48-59.

(责任编辑 何志刚)